

# 名士、巾子与士人风尚

## ——汉晋士人的着巾风尚

文 / 张玉安

**摘要：**巾子是一种首服，在东汉末年之前主要为庶人所戴，而贵族子弟成年后则戴冠。汉末魏晋以来，在名士们的示范效应下，士大夫和普通士人都开始竞相以戴巾子为雅，并成为一种时代风尚。巾子也由此而衍生出幅巾、林宗巾、葛巾、菱角巾、折角巾、角巾等不同名目。名士地位的提高，意味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，并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体现在生活上，就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穿戴装束，逐渐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。在汉晋时期，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名士引领风尚、制造时尚的时代，其中郭林宗、袁绍、诸葛亮、王导、谢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**关键词：**名士；士人；巾子；风尚

### 1 汉末名士好幅巾

一个人名声大了，社会影响力就会随之增加，乃至其言谈举止、着装嗜好都会成为普通人效仿的对象。譬如一般人的衣服破了洞、打个补丁，通常会为人取笑。如果换了众人追捧的明星，就变成了别致和品味，引得一帮星迷争相模仿，甚而成为一时风尚。古往今来大都如此，汉晋时期也不例外，名士们的人格风范为世人所景仰，其容止也为后来者所称道，他们的仪形装束更为大家所追逐和模仿。譬如竹林七贤仪形不拘、披头散发、衫袖飘飘，就是很好的例子，这些都成为后来名士们放浪形骸的范本。汉末士人喜欢巾子也是这样。

《宋书·礼志》引《傅玄子》：

“汉末王公名士，多委王服，以幅巾为雅。是以袁绍、崔钧之徒，虽为将帅，皆著缣巾。”<sup>[1]</sup>

袁绍、崔钧都是汉末王公子弟，又是高级军事将领，但在穿戴方面，他们却不喜欢冠服

或身披戎装，而是像当时的名士一样，头戴幅巾、身着便服，体现出一副儒雅的将帅风度。此种风气应该来自汉末名士，这些人往往学富五车、人格高洁，其学问为士子所敬慕，人格为世人所称道，而且很多人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性，不愿意做官，常常首戴幅巾、一身平民装束以明志，更加显得与众不同。适逢汉末乱世，名士们为了自保不得不低调一些，然而却往往适得其反，愈发为各路豪强所注目，其影响力也就不胫而走。大儒郑玄的际遇便是如此，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载：“（何）进为设几杖，礼待甚优。玄不受朝服，而以幅巾见。一宿逃去。”<sup>[2]</sup>郑玄所以幅巾面见大将军何进，就是为了表明其不愿出仕的态度，而何进召见郑玄，也无非就是看中了他的社会影响力。《郑玄传》称：“建安元年，自徐州还高密，道遇黄巾贼数万人，见玄皆拜，相约不敢入县境。”<sup>[3]</sup>就连黄巾起义的农民军，都知道大儒郑玄的威名，他的家乡高密也

因此而躲过一劫。这样的待遇，恐怕连各路诸侯都享受不到。因此，自命清高的袁绍千方百计胁迫郑玄跟随自己的大军出征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至于袁绍、崔钧等着缣布做的幅巾，既是出于对名士的羡慕，也是为了体现自己虽为将帅，但也懂得学问和儒雅，以示身份的高贵。这就如同今天的某些官员和商人，想方设法也要弄到一个博士学位，摇身一变成为有文化的官员和儒商，顿时罩上了一层夺目的光环。

幅巾，是汉末以来十分简便的一种首服，即长宽与布幅相等的一块方形头巾，直接蒙在头上系结于脑后(图1)，但随之逐渐发展出各种较为复杂的样式。幅巾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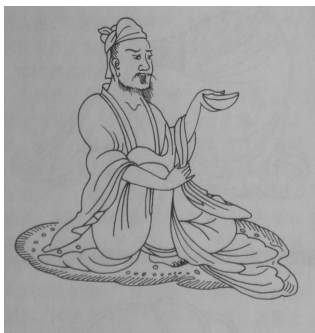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:南朝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》画像砖中首着幅巾的山涛形象

巾子的一种，而巾子通常为平民所戴。《释名·释首饰》称：“巾，谨也。二十成人，士冠，庶人巾。”<sup>[4]</sup>可见汉魏以前，士以上在成年以后戴冠，而普通的平民则用巾子包头。像郑玄这样的名士戴幅巾，明志的成分更多些。汉末以来，喜欢着幅巾的名士当然不止郑玄一人。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载：

“邻里有争财者，持兵而斗，(高)凤往解之，不已，乃脱巾叩头，固请曰：‘仁义逊让，奈何弃之！’于是争者怀感，投兵谢罪。”<sup>[5]</sup>

“亭长以韩征君(韩康)当过，方发人牛修道桥。及见康柴车幅巾，以为田叟也，使夺其牛。”<sup>[6]</sup>

“法真字高卿，……为关西大儒。弟子自远方至者，陈留范冉等数百人。性恬静寡欲，不交人闲事。太守请见之，真乃幅巾诣谒。”<sup>[7]</sup>

高凤、韩康、法真，皆为汉末名士，要么人格高尚、德音远播，要么学术渊博、为四方学子所宗，其共同的装束都是以巾子裹头。他们立身清廉、不慕虚名，却名声远扬，为士人、宦及平民共所仰慕。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穿戴，自

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巾子也逐渐由平民专有的装束，转变为士人学子乃至达官贵人所崇尚的首服。名士们更是以着巾为雅，竞相效仿。

《三国志》：“孙策略地江东，(华)歆知策善用兵，乃幅巾奉迎。”<sup>[8]</sup>

《江表传》：“(蒋)干有仪容，以才辩见称，独步江、淮之间，莫与为对。乃布衣葛巾，自托私行诣(周)瑜。”<sup>[9]</sup>

《博物志》：“(魏文)帝善弹棋，能用手巾角。时有一书生，又能低头以所冠葛巾角撒棋。”<sup>[10]</sup>

从三国名士华欣、蒋干到不知名的书生，头戴巾子俨然已经成为社会风尚，尤其士人学子和士大夫们，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名士效应。枭雄司马懿身穿戎装与诸葛亮对阵，当他看到武侯头戴葛巾、手持羽扇、从容若定指挥三军的时候，也不由自主地发出衷心的赞美，对诸葛亮的名士风采感叹不已。

《语林》：“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，将战，宣王戎服莅事；使人观武侯，乘素舆，著葛巾，持白羽扇，指麾三军，众军皆随其进止。宣王闻而叹曰：‘可谓名士矣！’”<sup>[11]</sup>

诸葛亮不穿甲冑爱葛巾，应是一副学士装束，也是国人心目中儒雅将帅的典型形象。这当然是诸葛武侯的个人爱好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饱读诗书的大学士，战场上指挥三军厮杀，也不失其儒者风采。但诸葛亮的装束不免也受当时名士风度的影响，故对幅巾之类首服情有独钟。葛巾，即用葛布做成的巾子，可以是幅巾，也可以裁为其它款式，依个人爱好而定。就三国时期的史料而言，我们尚没有发现所谓羽扇“纶巾”的诸葛武侯形象，至于明代人所拟硬胎的“纶巾”(图2)式样，也还未见出土实物之印证。



图2:明代王圻《三才图会》中所拟纶巾样式

汉末巾子流行，名士们的示范作用是不

容忽视的。但从社会原因分析，汉末皇权衰落，国家礼仪法度遭到重创，加之四方诸侯、豪强兴起，民间和地方人士的行为所受诸多约束获得缓解。因此，巾子得以在民间士人中穿戴，并因名士的好尚，而逐渐扩展至地方豪强及王公贵族，这是皇权日衰的一种表现。同时，战争导致民生凋敝、物产不丰，而巾子用料节省、裁剪方便、简洁适用，士人们也就顾不得繁文缛节，弃冠而戴巾了。魏晋以降，由于玄学之风日益兴盛，传统的名教礼仪进一步受到冲击，玄学名士在装束上再也不受正统礼教的束缚；而士冠礼也仅仅成为一种成人仪式，士人在平时已经很少戴冠，更多的是着巾或露发，南朝砖刻画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》中的相关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(图3)。



图3: 南京西善桥出土南朝画像砖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》

## 2 郭林宗与角巾的流行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巾子的款式发生了很多变化，除了幅巾，最有名的就是角巾，或曰折角巾、林宗巾。这种头巾的始作俑者是汉末名士郭泰(字林宗)，一个偶然的际遇，让他成为后世角巾的创始人。

《郭林宗别传》曰：“林宗尝行陈梁之间，遇雨，故其中一角露而折，二国学士著巾，莫不折其角，云作林宗巾。其见仪则如此。”<sup>[12]</sup>

《后汉书》：“(林宗)尝于陈梁间行遇雨，巾一角垫，时人乃故折巾一角，以为林宗巾。其见慕皆如此。”<sup>[13]</sup>

两处引文大同小异，言汉末名士郭泰曾在陈、梁之间经过，路上遇雨，雨水打湿了头巾，使得其中一角折了下来。陈、梁两地的士人看到后倾慕不已，纷纷把自己的头巾也折下一角，成为一时风尚，并称之为林宗巾，也就是后来角巾、折角巾的前身。由此，可见名士影响力之一斑。“巾一角露而折”和“巾一角垫”，均指头巾因沾湿而折了一角，但具体的样式我们无法确定。高春明《中国服饰名物考》以为，唐代孙位《高逸图》中一名隐士所戴前额下垂一角的巾子(图4)，即是林宗巾(角巾)的原始形态。<sup>[14]</sup>因缺乏更多传世和出土资料的佐证，姑且暂备一说，以待后来者补益。

林宗巾影响深远，在经过逐渐的加工变形之后(图5、图6为菱角巾)，角巾从汉末一直流行到南北朝中后期，甚至到了明代还保留有折角巾的款式(图7)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士皆以角巾为雅，“角巾”甚至一度成了名士清高自守的代名词。

《晋书·羊祜传》：“(祜)尝与从弟琇书曰：‘既定边事，当角巾东路，归故里，为容棺之墟。’”<sup>[15]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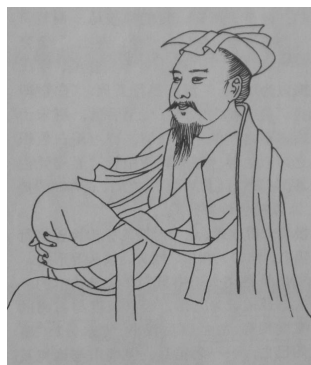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: 唐代孙位《高逸图》中戴角巾的士人



图5: 传唐代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图》中戴菱角巾的陈废帝陈伯宗



图6: 唐代孙位《高逸图》中戴菱角巾的士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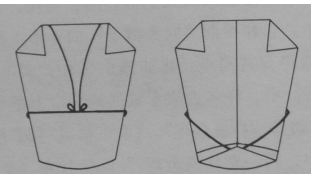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: 据《汝水巾谱》绘明代折角巾

《南齐书·徐孝嗣传》：“建武四年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孝嗣闻有诏，敛容谓左右曰：‘吾德惭古人，位登袞职，将何以堪之。明君可以理夺，必当死请。若不获命，正当角巾丘园，待罪家巷耳。’固让不受。”<sup>[16]</sup>

《梁书·谢朓传》：“既至，诏以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朓辞脚疾不堪拜谒，乃角巾肩舆，诣云龙门谢。”<sup>[17]</sup>

羊祜、徐孝嗣、谢朓都是当时的名士。羊祜表示自己功成身退的意愿时说“角巾东路，归故里”，徐孝嗣不愿为官则说“角巾丘园，待罪家巷”，可见“角巾”已经成为名士们辞官时口头的一种说辞，毋宁说，角巾乃是名士清高临世、洁身自守的一种标志。梁时皇帝下诏要封谢朓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，这可是普通人终生的梦想，谢朓为了表达自己不愿出仕的决心、但又不想得罪皇帝，于是头戴角巾、坐着肩舆到云龙门面谢皇恩。头戴角巾，既能昭显名士的高雅，又能委婉地谢绝皇帝的邀请而不用触怒龙颜。角巾的广泛流传及其后来的这种标志性作用，和郭林宗本人的身份、地位是密切相关的。郭泰虽身为汉末名士、大儒，却终身没有为官，但所到之处几乎倾城空巷，受到儒生、学士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。《后汉书·郭林宗传》载：

“(林宗)游于洛阳。始见河南尹李膺，膺大奇之，遂相友善，于是名震京师。后归乡里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，车数千两。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，众宾望之，以为神仙焉。”<sup>[18]</sup>

一个布衣儒生，在离开京城洛阳时，送行的车辆竟然达到数千，人们像仰望神仙一样欢送这位名动京师的大学士，个中原因，就是其社会影响力。据《后汉书·许劭传》称：“天下言拔士者，咸称许、郭。”<sup>[19]</sup>也就是说，朝廷在选拔任用官员的时候，许劭和郭泰的臧否十分重要，而他们对一个人的品鉴也往往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。《后汉书·郭林宗传》记载，郭泰曾评价、奖拔才俊六十多人，后来都成为当时的知名人士。他的一句话，甚至让名士陈元方百日

没有宾客。

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：“陈元方遭父丧，哭泣哀恸，躯体骨立。其母愍之，窃以锦被蒙上。郭林宗吊而见之，谓曰：‘卿海内之俊才，四方是则，如何当丧，锦被蒙上？孔子曰衣夫锦也，食夫稻也，于汝安乎？吾不取也！’奋衣而去。自后宾客绝百所日。”<sup>[20]</sup>

孔子说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……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”<sup>[21]</sup>对儒家君子而言，服丧期间穿锦衣、吃香米饭，既是对死者的不敬，也是士人道德修养的缺失。尽管陈元方孝敬有加，为父居丧期间身体骨瘦如柴，但睡觉时母亲给他盖上的那床锦被，却被郭林宗看见，最终招来众人离弃的结果。正是因为郭林宗自己的人格力量，才让他的话具有了如此强烈的感召力。就是这种感召力，让当时的儒生、学士们视郭林宗为心目中的楷模，也就有了爱屋及乌，将他被雨水折了角的巾子奉为时尚的佳话。郭林宗学识渊博、立身高洁、终身不仕，成为后来学子心目中高人雅士的象征，而由他所创制的林宗巾、角巾也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们竞相效仿、以表心志的一个精神符号。

### 3 士人风尚的社会效应与意涵

汉晋以来，由名士所引领的服饰风尚并不止“林宗巾”一例。

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：“时帑藏空竭，库中惟有练数千端，鬻之不售，而国用不给。导患之，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，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，练遂踊贵。乃令主者出卖，端至一金。其为时所慕如此。”<sup>[22]</sup>

《宋本玉篇》：“练，所于切，纺粗丝。”<sup>[23]</sup>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：“练，一种粗的麻织物。”<sup>[24]</sup>练布，无论作为粗丝布、还是粗麻布理解，都是一种质地粗疏的布料，并非布中的上品。东晋初年在经历苏峻叛乱之后，国库空虚，只剩下几千端练布（二端为一匹），卖也卖不出去，眼看国家财政即将枯竭、无以为继。于是丞相王导

和朝里的一班官员,带头穿起了练布做成的单衣,引得士人们一时以穿练布单衣为时尚,练布的价钱也成倍上涨,国家财政困难很快得到了缓解。通常情况下,粗布衣乃是平民的装束,至于魏晋贵族,主要还是以穿绫罗绸缎为主。但适逢国家丧乱、民生凋敝,从丞相到朝中官员穿练布单衣,也是情理中的事情。由于王导不仅是丞相,还是朝野上下共仰的名士,他手下那班朝贤也不乏名流俊秀,他们的穿着自然会成为普通士人追逐的对象。这样,一股以练布单衣为美的时尚也就翕然在士子中风行开来;昔日无人问津的练布,突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时髦货。

借用这种名士与社会风尚的微妙关系,太傅谢安还曾经为他的同乡做了一次推销扇子的免费广告。

《续晋阳秋》:“(谢)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者,安问其归资。答曰:‘岭南凋弊,唯有五万蒲葵扇,又以非时为滞货。’安乃取其中者捉之,于是京师士庶竞慕而服焉。价增数倍,旬月无卖。”<sup>[25]</sup>

看来,谢太傅不仅能从容若定指挥千军万马,而且还深谙名士的轰动效应,只是手把蒲葵扇、轻轻一摇便扇得那些士人和逐风的谢氏粉丝(Fans)们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将本来不合时令的压仓货(五万把蒲葵扇)买了个精光。如果谢太傅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,恐怕不会输给任何一位时尚明星。事实证明,一种社会风尚的兴起,除了名流有意无意的引导外,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而时尚只不过是人们内心追求的一种外在折射,是社会文化潮流的一个风向标。通过对某个社会时期之风尚的深入考察,就可以发现其时代变迁的轨迹。就汉晋以来名士引领社会风尚这一现象而言,可以看出皇权的衰落,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崛起,士的社会地位愈来愈受重视,他们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,为中国后来形成士大夫与皇权的相互制衡奠定了基础。

#### 4 结语

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,导致皇权衰落,并进一步造就了汉晋士大夫地位的不断提升。士大夫地位的这种变迁,反映在社会生活方面,就是名士引领着社会风尚。具体到服饰方面,就是形制由繁复、谨严而趋于简单、随意;由讲究地位身份、符合礼制,而趋向风神气度、洒脱飘逸;由注重社会评判,而趋于个性展现;由注重国家礼法的等级规定,而过渡到名士风流的示范效应。总之,士大夫个体生命的觉醒,带来了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索;而名士们在衣冠服饰方面所展现出的风采,恰恰是个体生命价值取向的一种外在彰显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[梁]沈约. 宋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6:520.
- [2][3][5][6][7][13][18][19][宋]范曄. 后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3:1205、1209、2769、2771、2774、225、2225、2234.
- [4][清]王先谦. 释名疏证补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:236.
- [8][9][10][晋]陈寿. 三国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8:401、1265、90.
- [11]鲁迅. 鲁迅辑录古籍丛编(第一卷)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:10.
- [12][唐]欧阳询. 艺文类聚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:1187.
- [14]高春明. 中国服饰名物考[M].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1:256.
- [15][22][唐]房玄龄. 晋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:1020、1751.
- [16][梁]萧子显. 南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7:773.
- [17][唐]姚思廉. 梁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6:264.
- [20][25]余嘉锡. 世说新语笺疏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:549.
- [21]杨伯峻. 论语译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0:188.
- [23]《宋本玉篇》(张氏泽存堂本),北京市中国书店,1983年影印,495.
- [24]王力. 王力古汉语字典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5:924.

(收稿日期:2015年9月3日)